

揭開朗克史學客觀主義的外衣

吳 于 廬

本文共分兩節：第一節簡略地介紹朗克的學術活動及其影響；第二節描述朗克客觀主義史學有那些主張，然後揭露朗克在客觀主義的外衣下宣揚了什麼樣的思想，這些思想為誰服務。

客觀主義是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史學一塊裝璜門面的招牌。最先把這塊招牌挂起來的，是十九世紀德國史學家朗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朗克在他的長期學術活動中標榜兩個法寶：一個是掌握第一手材料，一個是根據這種材料寫出“不存偏見”的歷史。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的初期，西方資產階級史學家一直把朗克奉為近代歷史學的正統。他們以為朗克對待歷史的態度，猶之哥白尼、伽利略、牛頓對待自然的態度；科學家怎樣研究自然，朗克就怎樣研究歷史；朗克和自然科學家一樣地尊重事實，一樣地承認事實是科學中的最高權威。這種尊重客觀事實的態度，據說是朗克史學的特點。因為人們相信他具有這樣的特點，所以，朗克才被認為是客觀主義史學的祖師。從十九世紀起，凡想為自己披上一件“科學”或“客觀”外衣的西方資產階級史學家，幾乎無一不沿襲朗克的道路。

在西方資產階級的史學史上，朗克是以詳盡地占有史料，著述宏富和影響深遠著稱的。我們應當首先看看朗克占有了一些什么樣的史料、寫了那些書、影響了那些學者。為了認識和批判朗克的史學，最好是這樣入手。

朗克對於第一手材料的搜集，在數量上的確是大有可觀。第一手材料是客觀主義史學起家的老本。沒有那一堆前人未見到的材料，也就挂不起客觀主義的招牌，掩蓋不了人們的耳目。因之除早年寫的第一書和晚年的最後一書外，朗克在寫絕大多數著作時，都講究搜集第一手材料。他曾經花了很多時間周遊西方各國，自稱這些遊歷是“科學旅行”，目的是為了“發現和用近代各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材料”。他接觸十六世紀威尼斯外交使節的文書，是在受到普魯士權貴的賞識、并被提拔到柏林大學擔任“非常額教授”時才開始的。他說這類官家文書讓他開辟了眼界，從此立意要根據當時文獻重寫歐洲國家的近代史。為了研究南歐各國，朗克旅行到維也納。他從奧地利的帝國圖書館和帝國檔案庫搜集了大量的官方報告、記錄、年代記、威尼斯外交文書以及重要政治人物的日記等等。然後他到威尼斯，在這個長期被吸血的商業貴族統治着的城市里，朗克遍訪那些世家巨姓的藏書室和威尼斯的官方檔案庫。他在威尼斯的得意收穫，是發現貴族議員馬里諾·沙努圖(Marino Sanuto, 1466—1533)的日記。以後他又到過羅馬和佛羅倫薩。雖然梵蒂岡的檔案庫並沒有為這位路德教派的學者開門，但是朗克仍然從許多教廷貴族的私家收藏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材料。據他說，“在

贵族政治的全盛时代，特别是十七世纪，欧洲通行一种惯例，即掌理国政的世家，往往保留一部分公文書。这种风气在罗马可能比在其他国家为尤甚”。^①因之他认为研究十六、十七世纪的教皇史，教廷贵族的私家收藏比梵蒂冈档案库还要重要。这种不是从国家档案库就是从贵族私家收藏中搜寻官方文献的方法，几乎成为朗克一生追求第一手材料的唯一途径。为了写德国和普鲁士的历史，他到法兰克福、威玛、德累斯頓、达紹等城搜求各王侯小国的档案，在柏林利用普鲁士的国家档案。为了写法国历史，他到巴黎找档案，到比利时、英国、西班牙找档案。为了写英国的历史，他到倫敦、都柏林找档案，利用非力普爵土的收藏，又到巴黎和海牙搜求与英国有关的外交文件。总之，在朗克的心目中，档案库成为历史知识的源泉，档案库里有“最可信和最有价值的记录”。他说从维也纳所藏的文書之中，看到了“学术研究上的一个完整的将来”。^②

朗克是一个多产的史家。他的全集在1868—1890年间出版，共五十四卷，其中还不包括他晚年的“世界史”。他的第一本书是“拉丁·条顿各族史，1494—1514”（出版于1824）。这本书在许多方面代表了朗克史学的特点。书的范围是西欧。时间是十五至十六世纪中的一段。主题是政治史，其中特别注意政治人物的活动和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全书并不是根据原始档案写成的，但书后附了一篇史学批判。在这篇附录里，朗克力陈第二手材料不可靠，只有追寻第一手材料才能写出信史。在此后朗克所写的大部分重要著作中，不论是选题范围、研究重点和研究途径，大体上都不出由这一本书提出来的各种倾向。他的早期和中期著作如“十六、七世纪的奥托曼和西班牙王国”（1827）、“教皇史”（1834—36）、“宗教革命期间德国史”（1839—43，另附录一卷，1847）、普鲁士史（1847—48，原九卷，至1874扩大为十二卷）、“法国史”（1852—61）、“英国史”（1859—68）、“自宗教和约迄三十年战争的德国史”（1868）、“瓦倫斯坦”（1869）以及后期著作如“七年战争”（1870）、“1780—1790年间的德国”（1871—72）、“1791—1792革命战争的起源”（1875）、“腓特烈大帝”（1878）等等，无一不以十六、七或十八世纪西欧国家政治史为主题，其材料来源则为有关国家的档案。朗克很少研究其自身所处的时代，除了“哈登堡传”和“腓特烈威廉四世传”，只有一本“塞尔非亚革命”（1879年扩大为“十九世纪的塞尔维亚和土耳其”），是研究十九世纪问题的著作。他的篇幅较大、流传较广和影响较深的几本书，主要的研究范围都不出十六、七世纪。

从上文所作的简略介绍，已可看出朗克史学不仅以政治史为主题，而且以官方档案为“最可信”的根据。因此他的所谓“客观”和“冷静”，实际是倚着内阁会议室的臆口，戴着官方眼镜，来观察历史。

朗克史学在西欧各国留下很深的影响。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朗克的门生和再传弟子几乎垄断了德国各大学的史学讲座。朗克对原始材料的重视，影响了当时资产阶级史学界搜集和审订档案文献的学风。篇幅浩繁的“日耳曼历史文献汇编”，虽然不由朗克创始，但是朗克的支持，许多门徒的积极参与，对“汇编”都起了促进作用。朗克本人以“汇编”为其研究班训练学生的材料。其重要门徒魏滋（Georg Waitz, 1813—86）曾经做过“汇编”的主编。魏滋和另一门徒基斯布莱希特（Frederich Wilhelm Giesbrecht, 1814—89）把朗克客观主义的治学方法运用于中世纪史，广泛地传播了朗克的影响。塞貝尔（Heinrich Sybel, 1817—

①、② 朗克，教皇史，序言。

95, 朗克門徒)和德羅森(Gustav Droysen, 1838—1908, 朗克的再傳弟子)從另一方面繼承了朗克。他們把隱蔽在朗克史學中的反民主思想和普魯士主義大加發展, 後來成為普魯士學派的骨干。朗克的外國門徒或再傳弟子也出現了有影響的人物。以研究意大利文藝復興史著名的瑞士史家布爾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97), 雖然不象朗克一意研究政治史, 但在迴避歷史理論、漠視社會經濟以及強調歷史人物的個性上, 無疑是繼承了朗克的衣鉢。在英國創立劍橋學派的阿克頓(Acton, 1834—1902), 也大聲宣揚客觀主義。所謂劍橋學派, 實際就是朗克史學在英國的發展。法國十九世紀中叶以後的史學家, 很多人把大部力量用於檔案文獻的研究。他們接受朗克的主張, 認為歷史必須是一種“實證科學”, 不允許以政治或宗教上的原因黨同伐異。他們主張每一論斷必須有原始材料和引文作証, 寫歷史就必須排斥一般概念, 不許可超出事實的範圍。這些見解由蒙諾德(Gabriel Monod, 1844—1912)在“歷史評論”(Revue Historique)創刊號的前言中發表, 而蒙諾德正是朗克大門徒魏滋的學生, 他所宣揚的正是朗克學派的思想。對於美國, 朗克史學也產生了影響。1884年, 當美國歷史學會成立時, 朗克被在美國的信徒們推選為唯一的榮譽會員。直到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 “美國歷史評論”雜誌還因為要不要放棄朗克的客觀主義而發生了激烈的爭辯。

我國的舊史學界, 同樣地流行過客觀主義。老一輩的史學家, 有那些人直接或間接師承朗克學派, 還不很了解。但是我們知道, 其中有些人曾經在朗克影響廣泛傳播的時期留學歐美, 他們不可避免地會沾染朗克學派的影響。所以不論他們自覺與否; 也不論他們的思想淵源如何複雜, 至少他們的某些著作都可歸之於客觀主義這一流派。他們照例強調原始文獻的重要, 以為只要找到原始文獻, 就有了科學的客觀論據。他們還主張“公正不阿”、“讓史料說話”。在好些論文里, 常常是引用的文獻多於作者的按語。這種貌為尊重事實的學風, 在解放後並未清除。從1958年各大學歷史系所揭發的問題來看, 客觀主義在我國史學界仍然耀武揚威, 不少史學家仍然相信它是引向科學真理的道路。因之挖一下十九世紀西方客觀主義史學的祖墳, 揭開朗克的外衣, 看一看在這件外衣下隱藏着什麼樣的貨色, 在今天史學界的兩條路線鬥爭中, 有極為現實的意義。

朗克沒有系統說明過什麼是客觀主義史學。但是從他著作的外表風格、從他一些零散然而在實質上是彼此聯系的史學言論, 可以看出他有一套很完整的主張。這套主張可以歸納為下列各點:

第一、歷史學的目的在於發現“客觀真理”。所謂“客觀真理”是指歷史上發生的事實, 而不是概括事實的一般概念。朗克在發表第一本書的時候, 曾經這樣說: 事實怎樣發生, 他的書就怎樣敘述。這就是他寫書的目的。他又說, “真理比羅曼司更有趣、更美”, 因此他“決心要在自己的著作中力避臆測和幻想, 要牢牢地抓緊事實”。[●]按朗克的想法, 歷史學的根本任務就是把歷史上的這件事實或那件事實弄清楚, 這個人物或那個人物弄清楚。歷史著作是歷史事實和人物在文字上的還原, 還原就是對“客觀真理”的探索。所以在歷史這門學

● 戈契(G. P. Gooch), 十九世紀的史學和史學家, 頁98引。

科里, 只有对“特殊”的研究, 没有对“一般”的研究。历史学家一涉及共同的因素或普遍规律的问题, 就要流为臆测和幻想。朗克主张历史学家不谈历史哲学。

第二、追求历史上的“客观真理”, 最可信的根据是原始材料, 由亲与其事者提供的第一手记载。朗克自称他的治学特点是善于运用批判的方法。所谓批判的方法就是追溯历史著述所依据的材料, 审查这些材料是否原始, 作者引用时有没有出入, 出入的背景何在。朗克在“拉丁·条顿各族史”的附录里, 运用这个方法批判了格奇阿底尼(Guicciardini)和馬基亞維里(Machiavelli), 结果发现他们所写的历史不可置信。在“教皇史”附录的第二节里, 朗克用了同样的方法批判两部关于特朗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的历史(一为 Sarpi 所作, 另一为 Pallavicini 所作), 结果也发现这两部书同样不可靠。由此朗克得出结论: 即凡一般的、第二手的著述都算不得信史, 因为作者往往怀着偏见, 有的是存心攻讦, 有的是蓄意辩护, 他们都没有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所以要写可信的历史, 必须从原始材料出发, 从“提供报道的最高见证者”出发, 让那些“亲历其境的人讲话”。朗克在晚年回顾他一生著作时, 曾说他所始终遵循的是逐字逐句遗留下来的材料。儘管历史上“有很多东西没有记载下来”, 但他仍然认为“对于记载下来的事实, 必须坚守不移”, 这就是史学的“不可动摇的法则”。

第三、既然朗克为史学订下了这样一条“不可动摇的法则”, 因此一个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就不能太广, 不能逾越第一手材料所规定的界限。有多少原始材料, 写多少历史。材料的内容是什么, 历史的内容也就是什么。这就叫做忠实于客观。这种学风流衍的结果, 几乎是除文献学而外无史学, 专题而外无历史。

第四、既然历史的目的在于根据文献来说明事实, 所以任何一个历史家都不应当对历史作价值判断。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辨别真伪, 而不是褒贬是非。对于历史上的争执, 他必须超然和冷静, 不应当用自己的政治和宗教的偏见来议论历史。否则他就是不客观, 就会削弱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因此朗克主张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实用, 不是为了借古鉴今。他在“拉丁·条顿各族史”的序言中说, “有人以为历史学的任务是判断过去, 为将来的利益而教训当前, 但是象这样高尚的作用, 这本书是不敢有所企求的, 它的目的只在说明真正发生的事实而已”。朗克貌为谦逊, 实则是要历史学家避免在历史中谈实用。只有不谈实用, 然后才能不褒贬历史的是非。

以上四点, 总起来说, 就是朗克的客观主义。我们并不以为, 朗克的主张没有一点合理的因素。例如对第一手材料的重视, 对专题研究的重视, 从主张本身看, 都不能毫不分析地说他无理。问题在于重视的是什么材料、什么专题、有什么作用、得出什么结论。事实上, 朗克对客观主义的主张, 并不能严格遵守, 因为象他标榜的那些东西, 只能有形而上学的存在。在本文中, 我们准备就这四点逐一批判。四点的错误很显然, 这可以留待以后再论。本文指出这四点, 是为了便于和朗克的史学实践对照。人们可以看看, 朗克在实际上拿出来东西与他叫人相信的东西究竟相去有多远。

本文虽然不打算逐条批判朗克的主张, 但仍应当指出: 朗克在两个问题上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是完全对立的。朗克主张不谈“一般”、不谈“共同因素”, 在实质上是

企圖否認歷史的規律性。朗克主張不存偏見，不作價值判斷，不從歷史中找教訓，這在實質上是企圖否認歷史學的党性，否認它為階級利益服務。大家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科學的根本任務，在於研究和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並運用這個規律改造社會，為無產階級的利益服務。否認了歷史規律性，否認了歷史學的党性，也就是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科學。因之朗克史學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歷史科學根本不相容。

然而由於朗克史學也重視材料，並且高談“客觀真理”，因而有其迷人的方面。許多人對朗克在材料上用的功夫表示驚服，相信他尊重客觀，相信他不把個人觀點注入歷史，並以為這就是歷史成為一門科學的必由之徑。朗克學派客觀主義這塊招牌之所以掛得高、掛得久，使人受其惑而不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此。因之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首先是要把這套客觀主義的外衣揭開，看看朗克是不是象他所主張的那樣，只講事實，不涉觀點。如果不是，則他在鋪敘歷史時貫串了什麼觀點，這些觀點的實質是什麼，是不是超然，是不是一無所為，也就是說，是不是沒有党性。把這些問題揭露之後，客觀主義史學的神話也就不攻自破了。

和一切的历史家一样，朗克不可能不在他的著作中貫串自己的各種觀點。這些觀點不可能不打上自己階級的烙印。

朗克首先宣揚歷史決定於統治階級的大人物。在表面上，朗克不象卡萊爾，他從來沒有發表過一套系統的大人物史觀。客觀主義的招牌，不允許他明明白白地這樣做。如果這樣做，就會敗露只講具體事實、不涉抽象原理的魔術。朗克比卡萊爾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不言道而道自明，不談大人物史觀而大人物史觀已經體現在全部著作之中。作為一個歷史家，朗克並不象他所標榜的那樣，以敘述事實為滿足。朗克也要求“剝去事物的外殼，找到它的核心”。什麼是歷史的核心呢？朗克用他的著作來說明，這就是由行動中表現出來的“人格”。資產階級的評論家，一般都指出：朗克對於歷史上的“人格”、“行動家”，抱有巨大的興趣；朗克的“史才”也就在於他最善鉤畫歷史人物；讀他的書，彷彿進入博物館，滿壁是過去人物的繪象。朗克自己也說，“沉酣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寶庫，面臨一切英雄，重新生活於一切事物之中，是最有興會的事情”。●朗克所說的“英雄”指的是些什麼人呢？這絕不是泛指一般人當中的杰出者，而是指統治階級中的政治人物。朗克的历史著作，幾乎都以統治階級政治人物的行動為中心。在他看來，歷史就是政治史，而政治史也就是統治階級政治人物的行動史。在他的重要著作“教皇史”中，多數章節都以人物為題。全書的重點第四卷，是以席克特斯五世(Sixtus, V, 1585—90)為中心。席克特斯五世之所以被放在這樣重要的地位，完全因為他是十六世紀政治行動最活躍和最精于治術的教皇。朗克不把他的書名為“教廷史”，而名為“教皇史”，原因也在於他最重視人物。這種把統治階級的政治人物視為歷史中心的觀點，不但“教皇史”為然，而且也見於其他著作。朗克在“十六七世紀奧托曼與西班牙王國”一書中，以土耳其皇帝為決定一切的力量，並把西班牙的國王比作一架龐大機器的“主要動力”。他說十七世紀西班牙的衰微，原因是王朝統治的不振。在“宗教改革時期的德國史”中，他又把馬丁·路德的人格視為決定的因素。其它如“法國史”，“英國史”，那些在十六、七世紀實行專制集權的國王和宰相，無一不是朗克加意描述的主題。朗

● 戈契，前揭書，頁7841。

克在写完英国依丽莎白女王的統治之后，接着就指出英国在十六世紀的变化，是取决于都鐸王朝統治者的个人意志。

由于朗克把历史看做是政治史，是統治阶级人物的行动史，所以社会經濟在他的历史中没有地位，人民羣众在的历史中也没有地位。他在“教皇史”第四編以整节的篇幅叙述席克特斯五世镇压“盜匪”的血腥活动。对于“盜匪”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产生，和十六世紀意大利的土地制度和农业变化有什么关系，他没有一个字交代。在“宗教革命期间的德国史”中，对于翻天覆地的农民战争，他完全采取忽視的态度。連资产阶级的評論家，都說那是全書中写得最弱的部分。現在我們全都知道，客觀的历史是物質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羣众所創造、所推动的历史。然而标榜客觀主义、声称尊重事实、并且不抱阶级偏見的历史家，却偏偏看不見这样的客觀存在，偏偏要把历史写成一小撮統治阶级政治人物的行动史。这是客觀还是主觀？是超然于阶级还是服从阶级的需要？任何人都会不待深辯就能得到应有的結論。

其次，朗克以历史为媒介，宣揚他的政治观点。在资产阶级的历史家中，朗克有許多条件可以把自己粉飾为一个超然于政治的学者。长达六十年的学术生活、客觀主义的招牌、比較冷靜的态度、穩練的文字工夫、在罕見的那麼多的著作之中而絕少談到当代的历史……所有这些，都容易遮盖他和现实政治的关系，使人不去注意他的学士道袍上染了什么样的政治色彩。但是事实是：朗克既然处身于十九世紀的德国，也就摆不脱十九世紀的德国政治。朗克在当时深受統治阶级的尝識，和許多当权人物保持密切的关系。他是普魯士王腓德烈·威廉四世的亲信。对于国王的反民主政策，他一貫拥护。他还写了不少备忘录，供給国王反击民主派的参考。在他到維也納作“科学旅行”的期間，他結識了以无行聞名的政客兼政論家根茲(Frederick von Gentz, 1764—1832)。根茲是法国革命思想的激烈反对者，因此做上梅特涅的高等幕宾。自命超然的朗克，却从根茲那里得到許多政治的教益。通过根茲，朗克又受知于梅特涅。他到威尼斯之所以能够出入官方档案庫，搜集那些他認為“最可信”的文献，就是依仗权势炙手的梅特涅的介紹。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瀰漫德国。普魯士外交部为了抵制这个影响，办了一个政治刊物，叫做“历史政治評論”。被物色来担任主編的，不是別人，正是主張史学必須超然于政治的朗克。朗克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好些論文。他反对普魯士制宪，說宪法不是万灵丹，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他認為共和国的思想是由美国輸入的，经过法国革命才傳播于欧洲。人民主权的概念、十八世紀唯理主义的思想，都被視為有毒的东西，这些毒素危害了欧洲各国政府的穩定。他还反对召开国会，認為等級會議比国会更好。朗克这些反民主的政治观点，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他的历史著作。事实是：朗克在他的各种著作中都巧妙地注入自己的政治观点，史学著作成为他宣揚君主集权、反对法国革命思想的工具。

朗克之所以对十六、七世紀西欧各国的历史特別有兴趣，是和他的政治观点分不开的。这几个世紀是西欧各国君主集权由成长而达于全盛的时代。后起的普魯士王朝，正图以加强王室統治的方式，达到統一德国的目的。朗克是普魯士王朝的拥护者，他的政治观点反映了普魯士統治阶级的利益。因此，除在有关德国史和普魯士史的著作中宣揚有利于普魯士王朝的观点而外，他还利用了“法国史”和“英国史”。在“法国史”中，朗克的敘述頂点是路易十四。路易十四的专制政体，构成全書的一个突出的主题。虽然德国人的民族感情，使他

不滿於路易十四的對外政策，但是對於路易十四的內政，他是頗為激賞的。路易十四一死，他的“法國史”也就幾乎終局了。在“英國史”里，他不惜替被革命羣眾送上斷頭台的查理一世辯護。他說查理一世具有殉道者的性格，因之一身雖死，却為將來挽救了他所維護的原則。對於克穆威爾，他不表同情。所以在褒貶之間，朗克顯然有自己的政治尺度。“英國史”在寫到威廉三世以後，也就漸趨結束。雖然朗克親身看到十九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發展，但他不感興趣，沒有為這個發展而把“英國史”延長。這和他在“1791—1792年革命戰爭起源”一書中反對法國的革命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至於被視為朗克客觀主義的典型著作“教皇史”，看來也不是無為而作。資產階級的評論家，常常強調朗克以新教徒而能平平靜靜地寫出“教皇史”，是難得的事情。其實問題不在於此。十九世紀時的教皇，對於新教已經一無能為。任何一個新教徒，都毋須對教皇怒目而視。朗克在“教皇史”的序言里也明明說新教早已穩如泰山，教皇對新教已經起不了什麼重要影響，沒有什麼可怕。但是在十九世紀變為無足輕重的教皇，對朗克卻別有用途。朗克從殭化的教皇中找到了十六世紀席克特斯五世，把席克特斯的集權描繪為教廷歷史上的盛世。這就使席克特斯在“教皇史”中起了路易十四在“法國史”中的作用。朗克用席克特斯的枯骨為專制集權擂鼓，他再一次利用歷史來作他政治觀點的註腳。

朗克既然擁護普魯士王室，反對當時的民主要求，對於從十九世紀中葉日益高漲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當然是更為敵視的。1870至1871年間，普魯士在戰勝法國之後，又幫助法國的反動勢力扼殺了無產階級第一個政權巴黎公社。朗克對這一罪惡的事件庆幸不已。他庆幸反動的歐洲對革命勢力取得了勝利。所以在十九世紀歐洲的革命浪潮中，朗克是資產階級的極右派。雖然他工於隱蔽，但是他的各種著作仍然以若明若暗的方式，宣揚他的政治觀點，為反動的政治服務。朗克是隱蔽的普魯士主義者。他曾經利用“宗教改革時期的德國史”，宣傳強烈的日耳曼民族意識。他的門徒、普魯士學派骨干之一塞貝爾，說這本書充滿了對“德國精神偉大行動”的熱情。另一個普魯士學派的重要人物特萊希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96），也把這本書推為朗克的傑作。在德國資產階級史學的各流派中，普魯士學派是明目張膽地為普魯士國家利益說教的。普魯士學派對朗克叫好，正是因為朗克和他們在學說觀點上有呼吸相通的地方。朗克在1836年由柏林大學非常額數教授轉任正式教授時，曾在他的就職演詞中大講歷史和政治的關係。可見所謂不從歷史取得實用教訓的說法，只是一個虛假的幌子，這個幌子連朗克自己也有時棄而不用。這裡不妨引用一下湯姆生對朗克的評語。湯姆生說，“在超然的‘不懷黨見’的朗克和他那些鮮明地有所偏袒的同輩和同時代人之間（如德羅森、特萊希克、塞貝爾——按：三人都屬普魯士學派），唯一的區別不過是那些人要比朗克更為坦率地說出他們的偏見而已”。●湯姆生在“不懷黨見”這幾個字上打了引號，其實在“超然”這兩個字上，也應當同樣地打上引號。朗克政治上的黨見，使他不可能“超然”。

又次，朗克是西方中心論者，並且利用歷史為西方國家的擴張找論據。在朗克的一生史學活動中，除去西歐拉丁·日耳曼各國的歷史而外，他幾乎沒有看見還有其它的历史。朗克晚年以前的著述，集中於西歐國家的某個時代或某個專題。這在表面上，是履行他的主張：有什

● 湯姆生，前揭書，頁186。

么材料,写什么历史。但是这仅仅是技术性的理由,真正的思想是朗克不肯明说的西欧中心论。朗克在晚年口授了一部多卷本的“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打破过去的局限。但是这部“世界史”很奇特,它的“世界”几乎仍然出不了西欧。在古代的部分,朗克对于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史,仅仅对埃及和前亚作了一个概要的回顾。希伯来史在这个概要的回顾中占了一定的比重。理由很清楚,因为在希伯来产生了和西欧有密切关系的基督教。全书的真正开场是希腊和罗马,然后就转入他所认为的世界历史的主流,这就是拉丁·日耳曼各国。朗克口授“世界史”,做法和过去不一样。他没有强调第一手材料,他大量利用了别人的成果。因为不这样,他就不可能以垂尽之年,把“世界史”讲到十五世纪,讲到可以和他已写的十六、十七世纪西欧各国历史互相衔接的地方。虽然这个想法没有在他的生前实现,但当朗克死去的时候,他已经离目标不远了。他的门徒杜夫(Alfred Dove, 1814—1916)从遗稿和笔录中整理出最后的一卷,这就使“世界史”一直叙述到1453年。于是朗克的晚年和早年著作之间,有了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这条线索就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拉丁·日耳曼各国是人类历史的主体。从宣扬这个荒谬的观点而论,朗克的早年著作,不过是最后的“世界史”的准备。

朗克在“世界史”中撇开东方史,据说也有资料上的理由。他认为东方的文献不是第二手,就是不可靠,因之不能据以写出客观的历史。只要稍知东方历史文献的人,都可指出这是对于客观事实的粗暴的抹煞。东方各国丰富的文献,处于十九世纪的朗克,不可能一无所知。尤其是关于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史学,十九世纪有过轰动学术界的发展。朗克口授“世界史”时,是1880年。早在四十五至五十年代,赖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拉沙模(Hormuzd Rassam)等人已经先后发现古代亚述的大量文书。楔形文字的解读问题,也早在1847年由罗林生解决,到1857年为学术界所公认。埃及的文献调查,从十八世纪末年开始。1809至1813年,法国出版了卷帙繁多的“埃及图志”。其后罗塞里厄(Rosellini)、商坡里昂(Champollion)、莱普修斯(Lepsius)都编印过多卷本的埃及文献。古埃及文的解读也早在1822年由商坡里昂解决了,那时朗克的第一本书还没有问世。莱普修斯从1842年起就和朗克同在柏林大学当教授,所编“埃及·阿塞俄比亚文献”十二卷,于1849至1856年在德国出版。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正当朗克学术活动旺盛的时期,他不可能看不到、听不见。可是当这位客观主义者着手于一部“世界史”的时候,却说东方缺乏第一手的、可靠的文献。这种对于事实的抹煞,证明他对东方历史的蓄意排斥。所以问题不在于史料,问题在于西欧中心论。在朗克的“世界”里,没有西欧以外国家插足的余地。不但没有东方,而且也没有斯拉夫各族。

朗克的“世界史”,是拉丁·条顿“六大民族”的历史,希腊罗马也只是他们的前奏。“六大民族”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兰西、日耳曼、英吉利和斯干的那维亚。这些民族从十六世纪前后起就向世界各地进行了殖民和商业活动。朗克在论述“六大民族”历史的时候,说这些民族异中有同,并且概括地称之为“三大呼吸”。什么是“三大呼吸”呢?朗克说:一、民族大迁徙,二、十字军运动,三、近代的殖民。●我们知道,所谓“六大民族”有许多更为根本的共同点。但是朗克看不见,却把这几点加以特别的强调。原因是为了什么呢?很简单,这是为了把自古以来的日耳曼和西方各国的征服活动加以理论化,为它安装历史发展的论据。所以“三大呼吸”实际就是一个形象化了的共同规律,一个扩张主义的

● 朗克,拉丁·条顿各族史,序论。

规律，西方殖民国家所要求的规律。客观主义者的表面文章，使朗克必须避免采用“共同规律”这类属于“抽象原理”的字眼；因之他得套上一件具体而又形象的外衣，称之为“三大呼吸”。文字上的把戏，是朗克吸引人而又蒙蔽人的手法之一。朗克并不是真的不谈“共同的因素”或“抽象的原理”。只要对他拥护的制度有利，他不但谈，而且是巧妙地谈、突出地谈。所谓“三大呼吸”，就是有力的例证。

最后，朗克还宣扬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朗克在表面上是諱言历史哲学的。但是諱言历史哲学不等于没有历史哲学，也不等于不运用历史哲学来说明历史。朗克的历史哲学是唯心主义。最显而易见的是用人的意旨、信仰来解释历史的变化。在“教皇史”第一卷里，朗克在论及意大利宗教思想时，涉及“信仰获救说”——即由对神的信仰而获得神的释罪的学说。朗克指出这个学说是出于马丁·路德，随即就说它“产生了全部的新教运动”。^①这就是说，宗教改革的根源不是西欧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和成长，而是一条由路德创始的宗教信条。这个说法和朗克的大人物史观是一致的。因为所谓大人物史观，就是说大人物的意志决定历史。然而朗克的唯心主义还不止于此，还有其更深隐的一面。他在为“历史政治评论”所写的论文中，在一些形式零散而内容明确的言论中，常常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即历史是一种超然的精神力量的体现。他教人不要以为历史是混乱的一堆，历史中有创造的、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赋予历史以价值和意义。什么是这种道德力量呢？朗克用各种词彙来答复：或者是“客观的概念”、或者是“崇高的权能”、或者是“生于各种因素之中而又使之合为一体的权力”……^②说法虽然不一，总的意图都是为了说明在历史的背后，有一个超人的精神实体，这个精神实体是上帝。唯其如此，所以朗克说，“国家是上帝的理想”，历史上的“每一行动、每一时刻……都为上帝作证”。^③在朗克的历史哲学中，所有历史上的“英雄”、“六大民族”，都不过是上帝藉以体现其神圣意旨的媒介。他们是历史剧的扮演者，而上帝则是导演和剧作家。所以不从历史的全程，就不能印证上帝的全能、全知和全在。这样的历史学，使朗克不会满足于历史的专题片段，他的最后归趋必然是通史或“世界史”。因之朗克说，“除通史外无历史”，又说他为一种“发展的崇高逻辑所吸引”，而这个逻辑也就是“上帝之道”。正因朗克把历史逻辑和上帝之道混而为一，所以他又说，“历史就是宗教，或无论如何，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④既然以历史为宗教，则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出于神意。于是朗克又引到另一个论点：在上帝的面前，历史上的世世代代都名分相等。在朗克生活着的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过去曾经有过的革命性。对于它曾经反对过的历史上的旧时代，现在已经不再憎恶了，因为它正在集中力量来对付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朗克所谓历史上的世世代代都有同等的名分，恰好是当时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反映。

由上所论，我们已不难看出在客观主义外衣掩饰下的朗克史学的面貌。客观主义主张历史应该根据史料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怎么发生，历史就怎么叙述。但是朗克没有这样，

① 朗克，教皇史，卷一，II. 1.

② 汤姆生，前揭书，页182。

③ 戈契，前揭书，页7751。

④ 戈契，前揭书，页87、8851。

他对发生了的历史事实作了取舍，取舍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史料。不论他是意图写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或是写全世界的历史，他都不写社会经济、不写普通人民、不写西欧以外的各国(除了极个别例外)。放在他面前的史料，他可以视若无睹。客观主义又主张历史只研究具体事实，不涉抽象原理。但是朗克也没有这样，他宣扬了大人物史观、专制政体、西欧中心论、“三大呼吸”、甚至还宣扬了神学。客观主义还主张历史应当排除政治成见，不偏不倚，不为任何政治利益服务。但是朗克也没有这样，他在著作中贯穿了为普鲁士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观点，他对历史人物有所抑扬，而抑扬的标准又正是他自己的政治见解。当我们看到朗克的史学实践是如此，除了说客观主义是一块虚假的招牌，朗克史学是一个彻头彻尾具有资产阶级党性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流派，另外还能得到什么结论呢？

1960年5月